

传世散文精品库

圣人之道

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散文集

主编 堵军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传世散文精品库

圣人之道

主编 堵军

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散文集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人之道/堵军编. - 延吉:延边人民出版社,2004.9

(传世散文精品库)

ISBN 7-80698-293-0

I. 圣… II. 堵… III. 古典散文-作品集-中国 IV. I2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0128 号

责任编辑:崔承范

装帧设计:魏红

传世散文精品库

圣人之道——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散文卷

堵军 主编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, <http://www.ybcbs.com>.)

北京市通州区皇家印刷厂印刷

延边人民出版社发行 印数:0001—5000 册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9 印张 3150 千字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98-293-0/I·34

定价:389.00 元(全 14 册)

本卷定价:27.80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散文，源远流长，根深叶茂。它同诗歌一样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座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。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，继承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，从而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，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，特编辑出版这套“传世散文精品库”。

散文文体范围，代有嬗变，古今不同。本丛书所选，皆以文学性散文为主。入选作家，上始于先秦，下迄于清末。各类作品均单独成册。各书篇目排次，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，以便读者了解作者散文创作之发展与演变。

本丛书与以前的选本相比，有其显著的特点。一是在原文的选择上，选得比较全面、科学，充分考虑了当代读者的审美情趣，体现了“大散文”的概念；二是在体例上，从读者学习和鉴赏的实际出发，尽量做到通俗易懂，所以每篇原文之后，都有简明扼要的注释、准确的译文和精美的赏析，使读者不仅能读懂原文，还能从原文、译文和赏析中获得多重的艺术享受，并且每本书都

有原文作者的简介,可以使读者对各大名家有一个概括的了解,帮助读者对原文的理解;三是各本书的编著者都是当今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,他们以渊博的知识,严格的眼光,科学的治学态度,完全保证了本丛书的内容质量,使本丛书成为“信得过产品”。可以说,这套丛书是当今名人选编、注译并赏析古代名人名作的成功之作。

我忝为本丛书的主编,面对各位前辈的书稿,常被各位前辈谦虚的态度、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感动。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的人大、政协会议期间,赵朴初、谢冰心、启功、夏衍、叶至善、陈荒煤、吴冷西、张志公等八老提出的《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》,深感本丛书各本书的编著者与赵朴初等八老一样,都有一颗热爱中华文化,要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传给青年一代的滚烫的心,这尤其令人敬佩。

古人散文,多览物抒怀。故欣赏佳文,不仅可见锦丽江山,享卧游之乐;同时,还可知古同人之心,作世事之观。然而,古今易代,时移事迁,江山更秀,岂可以今人之心,作往古之幽思?思古人之怆然,惜今人之怡乐,不仅可作今昔对比,亦可激发斗志,再造山河,为后人之思我者,作一导游者焉。故选此编,并为序。

编 者

2004年8月

柳宗元简介

—

柳宗元(773—819),字子厚,祖籍河东(今山西省永济县),人称“柳河东”;最后贬官柳州,所以又称“柳柳州”。他出生于唐朝都城长安(今陕西省西安市)。他的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。父亲柳镇先后任过录事参军、长安主簿等职,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任殿中侍御史。柳镇为人廉直,曾因触犯权贵而被贬,这对柳宗元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柳宗元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宏伟的志愿,在后来写的《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》中说:“始仆之志学也,甚自尊大,颇慕古之大有为者。”向往于“励材能,兴功力,致大康于民,垂不灭之声。”贞元九年(793)二月,柳宗元二十一岁,考中进士。五年后(798),又中博学宏词科,授集贤殿正字。仕途顺达,并没有使柳宗元消泯远大的志向,也没有使他淡忘对家国的忧虑。面对当时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的黑暗现实,柳宗元始终以“辅时及物”为己任,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

贞元十七年(801),柳宗元调为蓝田县尉。两年后

(803),调任监察御史里行,与韩愈、刘禹锡等同官,并结识了王叔文。贞元二十一年(805)正月,顺宗李诵即位,王叔文等当权,柳宗元升任礼部员外郎,参与政治革新活动。他抱定主意,要“唯以中正信义为志,以兴尧舜孔子之道,利安元元为务”(《寄京兆许孟容书》)。王叔文等人执政后,实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,如取缔劫掠民财的“宫市”和“五坊小儿”,免除正税以外的苛捐杂税,把长期被藩镇垄断的盐铁转运大权收归中央,并试图接管宦官兵权,等等。没想到事与愿违,不到八个月时间,在宦官和藩镇势力的逼迫下,顺宗让位于他的儿子宪宗李纯。宪宗一即位,王叔文等人便相继被贬。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,未及到任,又加贬为永州司马。同时被贬的还有刘禹锡、韦执谊、韩泰等共八人,历史上称为“八司马”。

永州的州治在今湖南省零陵县,在当时相当荒僻。柳宗元虽官为司马,实际上是形同“编管”的罪犯,有职无权。元和元年(806),宪宗改元大赦,但却明确诏令:“八司马”“纵逢恩赦,不在量移(即调升)之限”。王叔文也被朝廷处死。朝廷内外一些趋炎附势的人,对柳宗元等“诋訾万端,旁午构扇,尽为仇敌”(《寄京兆许孟容书》)。柳宗元虽然自认为是“以愚触罪”(《愚溪诗序》),但身在贬所,又遭受朝廷内外种种诬陷诽谤,心情不免十分痛苦。

政治的挫折,处境的困难,并没有压弯柳宗元的铮铮铁骨。在《诚惧箴》里他说:“起而获祸,君子不耻。”认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,即便遭受灾祸,也无所畏惧。在《忧箴》里他更明确地指出:“所忧在道,不在乎祸。”他真正所

忧虑的是“道”之不行，而不是个人的安危与得失。

于是柳宗元就像孔子、司马迁等先哲一样，既不能进而得志于今世，就退而著书立说，以贻后世。在《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》中他说：“仆之为文久矣，然心少之，不务也，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。故在长安时，不以是取名誉，意欲施之事实，以辅时及物为道。自为罪人，舍恐惧则闲无事，故聊复为之。然而辅时及物之道，不可陈于今，则宜垂于后。今而不文则泥，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！”这就是说，在贬官之前，柳宗元锐意于朝政改革，虽为文已久，却不自重视；在贬官之后，“辅时及物之道”在现实中行不通了，他才着意著书立说，期望能将此道传于后世。他发奋钻研经史诸子，“读百家书，上下驰骋”（《与杨京兆凭书》），并大胆地“断往古，明圣法。”（《与顾十郎书》）。有时也“长吟哀歌，舒泄幽郁”（《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》），创作讽谕杂文和抒情诗歌。他的许多重要的著述，都是在永州的十年中写成的。

到了元和十年（815），柳宗元与同时被贬诸人被召回京师，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。他深深地感叹：“十年憔悴到秦京，谁料翻为岭外行！”（《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》）《旧唐书》本传说柳宗元贬后不复起用，是因为“众畏其才高”，他自己也说：“直以慵疏招物议，休将文字占时名。”（同上诗）这恐怕不是主要原因。主要原因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和为人不合时宜。

柳宗元的思想无疑是以儒家思想为主，他曾表示自己“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”，“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嫌”（《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》）。但他也汲取诸

子，兼融佛老，并有所侧重。他明确不二地以“急生民之困”为本，从解救“生人之患”出发，强调“辅时及物之道”，这就是他“行尧舜孔子之道”的真正内涵。为此他坚定不移，百折不挠，在《答周君巢饯药久寿书》中他说：“苟守先圣之道，由大中以出，虽万受摈弃，不更乎其内。……仕虽不达，无忘生人之患，则圣人之道幸甚。”

柳宗元的为人愚拙耿直，方正不阿，肆言无忌，这常常使他被误解，甚至遭诽谤。当他身在贬所之际，虽然常常希望有人为他剖白辩冤，为此也给一些关心他的官僚写过“陈情书”之类的书简；但是，他却从来不曾明确忏悔自己有什么“罪过”，更不曾向皇帝乞怜请罪。皇帝是以对自己的忠诚程度来检验臣下的，而柳宗元却执着地以对“圣人之道”的忠诚和对“生人之患”的关心来要求自己，这怎么不落下不合时宜的口实呢？这一点韩愈比柳宗元“聪明”，在《潮州刺史谢上表》中他曾坦率而诚恳地对皇帝说：“倘非陛下哀而念之，谁肯为臣言者？”所以他在被贬之后不久就复官了。

柳宗元在永州时已经多病，到柳州后；由于心情抑郁，工作勤苦，健康状况更加恶化。元和十四年(819)十一月八日；他因病在柳州逝世，终年四十七岁。次年，柳州百姓为他修了衣冠墓。三年后，又为他在罗池地方盖了山座庙（现为柳侯祠），永远纪念他。

二

柳宗元的文学主张，与他的思想和为人是相表里的。

首先，柳宗元明确地主张吁文以明道”，反对“以辞为工”，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他说：“始吾幼且少，为文章，以辞为工。及长，方知文者以明道，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、务采色、夸声音而以为能也。”在《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》中他也说：“道假辞而明，辞假书而传，要之，之道而已耳。”他认为文学的功能是歌颂赞扬美好的事物，批判讽刺丑恶的事物，在《杨评事文集后序》中说：“文之用，辞令褒贬，导扬讽谕而已。”那么，他要“明”的是什么“道”呢？在《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》中，他说：“其归在不出孔子。”原来，他要“明”的首先是孔子之道。他又说：“大都文以行为本，在先诚其中”，可见他所说的“明道”，又首重德行和中诚，与“教条主义”地要求文学本于六经的观点是不甚相同的。

其次，柳宗元强调要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旁通博采的学习精神。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他说：“故吾每为文章，未尝敢以轻心掉之，惧其剽而不留也；未尝敢以怠心易之，惧其弛而不严也；未尝敢以昏气出之，惧其昧没而杂也；未尝敢以矜气作之，惧其偃蹇而骄也。抑之欲其奥，扬之欲其明，疏之欲其通，廉之欲其节，激而发之欲其清，固而存之欲其重，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。本之《书》以求其质，本之《诗》以求其恒，本之《礼》以求其宜，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断，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动，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，参之孟、荀以畅其支，参之庄、老以肆其端，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，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，参之《太史公》以著其洁，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文也。”这就是

说,文学创作既要戒除“轻心”、“怠心”、“昏气”、“矜气”,采取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;又要追求“奥”而“明”、“通”而“节”、“清”而“重”,即含蕴不露而又意义明朗、文气疏畅而又言辞简洁、清雅不俗而又庄重不浮的多样化的艺术风格;还要旁通博采经、史、子、集等著作中前人的艺术经验。类似的想法,柳宗元在《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》、《与杨京兆凭书》等文章里也多次谈到。

柳宗元曾把文章分为两大类:“辞令褒贬,本乎著述”,“导扬讽谕,本乎比兴”(《杨评事文集后序》),他是二者兼能的。他一生创作了五百多篇散文,其中成就较高的是论说文、寓言、山水游记和传记。

柳宗元的论说文,包括哲学、政治专门论著以及带有论事说理性质的书简、序跋、杂体等文章。这些论说文,在思想倾向上往往论证古今,独抒己见,敢破传统,立意深远。有的学究天人,独立不惑,如《贞符》、《天说》、《时令论》、《断刑论》、《褚说》、《非国语》等;有的针砭时弊,有感而发,如《封建论》、《六逆论》、《晋文公问守原议》、《桐叶封弟辨》、《伊尹五说桀赞》、《梁丘据赞》、《序棋》等。柳宗元自己曾说:“余勇不自制,以当后世之讪怒”(《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》),他的论说文在思想上的确具有一种冲破传统、所向无敌的锐气。

在写作特点上,柳宗元的论说文大多观点尖锐,显露明朗,毫不遮遮掩掩、吞吞吐吐。例如,《贞符》大胆揭示:“是故受命不于天,于其人;休符不于祥,于其仁”;《封建论》强调指出:“故封建非圣人意也,势也”;《时令论》简捷说明:

“然而圣人之道，不穷异以为神，不引天以为高，利于人，备于事，如斯而已矣”；《断刑论》深刻揭露：“是知苍苍者焉能与吾事”，“且古之言天者，盖以愚蚩蚩耳”。所有这些，论点都精确透辟，一针见血，醒人耳目，发人深思。

而且，柳宗元的论说文大都运用丰富的论据和雄辩的论证，从而造成强大的逻辑力量。文章常常在正面阐述自己的论点的同时，逐层驳斥反面论点，并举出可靠的历史材料和生活事实来加以证明，有破有立。在篇章结构上一般完整谨严，线索明晰，而又富于曲折变化。修辞用语则精炼准确，饱含情感。正如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所说的：“雋杰廉悍，议论证据古今，出入经史百子，踔厉风发，率常屈其座人”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柳宗元是第一个较多地把寓言正式写成独立的文学作品的作家。他的寓言显然受到《庄子》的影响，但是他不像庄子所说的那样“不谴是非，以与世俗处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，而是鲜明地以寓言来讽刺现实社会政治中种种丑恶的现象。在他的寓言作品中，柳宗元巧妙地描写了小鹿（《临江之麋》）、驴子（《黔之驴》）、老鼠（《永某氏之鼠》）、螾蜃（《螾蜃传》）、小猴子（《袁王孙文》）、蝮蛇（《宥蝮蛇文》）、鸱夷（《瓶赋》）、猎人（《黑说》）、商贾（《鞭贾》、《招海贾文》）等生动的形象，借以对当时社会上那些仗势欺人、恃宠而骄、得意忘形、外强中干、虚张声势、凶残暴虐、追逐名利、贪得无厌、趋炎附势等等的丑恶人物加以猛烈的鞭挞和辛辣的讽刺，表示了对他们的蔑视、鄙视和憎恨。清人吴德旋《初月楼古文绪论》卷三三

认为，柳宗元“贬谪后之文，则篇篇古雅，而短篇尤妙，盖得力于《檀弓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最深”。如仅就他的寓言而言，则更多地得力于周秦诸子散文，但他绝不是因袭摹拟，而是自出心裁，戛戛独造。他的寓言一般都短小精悍，含意深刻，并大多意在言外，旁敲侧击，作者的讽刺并不直接表露在字面，而是凝聚在整个故事情节之中。柳宗元往往把深刻的道理寄托在简短的故事里，把自己的宏识孤怀寄托在生动的形象里，创造一种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”（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）的艺术境界，要读者去深思力索，心领神会。他的寓言娴熟地运用了比喻、夸张、幽默、对比、拟人化等寓言创作常用的表现手法，并能因文而异，因意而异。他借物讽人时，善于体物察微，抓住物类的特征，加以想象和夸张，塑造成真实而生动的形象。他的语言简练、犀利、明确，风格幽默沉郁。

柳宗元的散文最为世间传诵的是山水游记，特别是著名的“永州八记”。他的山水游记渊源于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，清人刘熙载《艺概》卷一：《文概》就说：“酈道元叙山水，峻洁层深，奄有楚辞《山鬼》、《招隐士》胜境，柳柳州游记，此其先导也。”但和《水经注》中山水的片断描写不同，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仅独立成篇，而且多写骚人迁客的感受。“游记而带骚体，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”（郭预衡《中国散文史》中册第九章第一节《柳宗元的用世之文》）。作者不只是模山范水，而是借物写心，抒发失意情怀和牢骚怨气，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。如前人评点《钴姆潭西小丘记》，说文中写小丘为“唐氏之弃地”，就是以“弃地比迁

客”；写小丘经过修葺后，面貌焕然一新，但因地在偏远的永州，所以无人赏识，这是“全为放臣写照”；篇末总评又说：“因贱直得丘而发感慨，即隐以自喻。”前人评《石城山记》，也说是“借石之瑰玮，以吐胸中之气。”（均见高步瀛《唐宋文举要》甲编）当然，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并没有游离于山水景物之外，而是把自己的性格、遭际与山水景物在精神上有机地融为一体，即物即我，即我即物，描写山水即是抒发感慨，从而创造出一种“心凝形释，与万物冥合”的艺术境界（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）。

柳宗元的山水游记，表现出作者准确而精细地捕捉和描绘山水形象的高超的艺术造诣。如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描写小石潭水的清澄明净，道：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；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怡然不动。仿尔远逝，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。”以游鱼、日光、鱼影等具体的形象来写水的清浅，正如画家用落叶的飞舞来画风一样，采用形象衬托的表现手法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而《游黄溪记》也写潭水，但因为初潭很深，“其略若剖大瓮，侧立各尺”，所以他就突出潭水颜色的深绿和浓重，道：“溪水积焉，黛蓄膏泞，来若白虹，沉沉无声。”又如《钴姆潭西小丘记》写山石“突怒偃蹇，负土而出”之奇，和《小石潭记》写水石“为坻为屿，为堪为岩”，用笔也因景而异，各有特色。

而且，柳宗元的山水游记，和他的其他散文一样，语言极其精美，正如他在《愚溪诗序》中所说的：“清莹秀彻，锵鸣金石”。林纾《春觉斋论文·流别论》评道：“记山水则子厚为专家，昌黎（韩愈）不能及也”。他认为“子厚之文，古丽奇峭”，“体物

既工，造语尤古，读之令人如在郁林、阳朔间”。

柳宗元早年曾与韩愈“期为史志甚壮”(《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》)，后因被贬逐远荒，不曾担任史职，但他却始终有着很强的写史的责任感。从他的《段太尉逸事状》中，我们可以多少看出柳宗元的史道、史笔和史才。正因为柳宗元有一片“辅时及物”之心，所以他特别看中了段秀实这位为民除暴、为民请命而不畏强权的历史人物，为他立传。而且，他所记载的段太尉的逸事，是经过实地考察采录而得的，在文章结尾处他说：“宗元尝出入岐周邢郿间，过真定，北上马岭，历亭障堡戍，窃好问老校退卒，能言其事。”这种讲究“录其事实”的“实录”精神(《汉书·司马迁传赞》)，正是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。文中描写段太尉形象，用笔传神，栩栩如生，柳宗元曾自许为“比画工传容貌差尚胜”(《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》)。

柳宗元的史笔和史才，还表现在他那些不入史乘的人物传记。特别是他极力为小人物立传，体现了中唐传记文学发展的新特征。他的这些人物传记也往往借题发挥，寓意深远。如《宋清传》写卖药致富的“长安西部药市人”，感叹士大夫不如“居市不为市之道”的市人；《梓人传》写一位名叫杨潜的建筑工，说明“梓人之道类于相”；《种树郭橐驼传》写长安西乡一位以种树为业的农艺家，引申出对政令烦苛的现实政治的批评。这种见识独到的史笔，可以说神似司马迁的人物传记。此外，柳宗元的这些人物传记还受到唐代新兴的传奇小说的影响。吴德旋《初月楼古文绪论》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：“柳文如《宋清传》、《螭传》等

篇，未免小说气，故姚惜抱（姚鼐）于诸传中只选《郭橐驼》一篇也。所谓小说气，不专在字句；有字句古雅，而用意太纤太刻，则亦近小说。”

此外，柳宗元的骚体之文，如《惩咎》、《闵生》、《梦归》、《囚山》诸赋，《吊屈原》、《吊苌弘》、《吊乐毅》诸文，以及《愚溪对》、《答问》、《起废答》诸对问之作，大都悲叹远谪，怀念故乡，忧怨愤懑，低回郁结，凄切动人。宋人严羽说：“唐人唯柳子厚深得骚学。”（《沧浪诗话》）这是因为柳宗元与屈原有着类似的生活遭遇和相通的思想精神，他以屈原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楷模，所以他效屈骚作文，就能深得屈骚之魂。

“总的看来，宗元文章具有两大特征。一是立论新颖，打破传统；一是牢骚太盛，出言多讽。宗元文章之两大特征，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。在韩柳之后，世之学为古文者，学韩者多，学柳者少。大概由于柳文个性太强，苟非其人，难于学到。”（郭预衡《中国散文史》中册第九章第一节《柳宗元的用世之文》）

三

柳宗元的诗文著作，早在他去世后不久，就由他的好友刘禹锡编为《河东先生集》，共三十卷。但此本在北宋初就已很少流传。据穆修在《河东先生文集后序》中说，他多年想找一部完整的柳集而未得，直到晚年才见到一个本子，收录诗文共四十五卷，显然已非刘禹锡原编旧物。这个本子

经穆修校定，曾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（1023）重新刊行，称《河东先生文集》。到北宋徽宗政和四年（1114），沈晦校定刊行《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》，即以穆修的本子为底本，以小字三十三卷本、曾丞相家本和晏元献家本等参考互证，还参校了有关书籍，共收诗文六百七十四篇。遗憾的是，上述几种柳宗元集，都早已亡佚了。

南宋以后，历代都有柳宗元著作的新校注本刊行，留传至今比较好的柳宗元著作的版本有：宋刻蜀本阙名《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》，南宋魏仲举编刻《五百家注柳先生文集》（残本），南宋郑定校刻《重校添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》（残本），南宋廖莹中刻世彩堂本《河东先生集》，元刻建本《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》，四库全书本《新刊诂训唐柳先生文集》，南宋叶桢刻永州本《柳柳州外集》。

1978年，吴文治等人重新校点了《柳宗元集》，由中华书局在1979年出版。校点者以宋刻蜀本《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》为底本，主要参校了世彩堂本、音辨本、诂训本、五百家注本、郑定本、永州本外集、《文苑英华》和《唐文粹》等，并参考了明刻蒋之翘辑注本《唐柳河东集》、明郭云鹏刻济美堂本《唐柳先生集》、明游居敬校刻本《柳文》、清何焯批校《王荆石先生批评柳文》、何焯批校《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全唐诗》及《乐府诗集》等。此外还参考了何焯的《义门读书记》、陈景云的《柳河东集点勘》、吴汝纶的《柳州集点勘》等书。应该说，这是迄今为止的一部比较完备精当的柳宗元的著作集。